

技术与乡村转型*——苏南淘宝村的实践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Practices of Taobao Villages in South Jiangsu Province

周静 ZHOU Jing

摘要 当前信息通信技术 (ICT) 已经高度介入社会发展并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把握空间性是技术“洪流”时代理解城乡发展变革不可或缺的路径。将ICT—行动者的影响嵌入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的讨论框架中,并以苏南地区淘宝村作为观察对象,对其空间生产进行较为全面的理论阐述。苏南地区淘宝村是鼓励具有实干精神的草根创新空间,经济组织发生了明显的跃迁,并正在成长为参与区域经济之全球竞争的重要基础。最后指出保持淘宝村持续的创新环境,需要多方行动者的协同努力,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规划师需要积极思考与应对的任务。

Abstract At present, ICT has been highly involved and become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whole society. Emphasizing spatiality is an indispensable way to understan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 the era of technological "flood". This paper embeds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discussion of Lefebvre space ternary dialectic, and theoretically describes the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aobao Villages that emerged in southern Jiangsu in recent years. It is believed that Taobao Villages in southern Jiangsu, with a remarkable rise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 are spaces for grassroots innovation with practical spirits, growing int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competition of regional economies.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maintaining the sustainabl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of Taobao Villages requires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multiple actors, as well as the tasks that planners need to actively think about and respond to in this process.

关键词 信息通信技术 (ICT); 空间生产; 淘宝村; 苏南; 转型

Key word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production of space; Taobao Villages; southern Jiangsu; reconstruction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2) 05-0013-06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r. 20220503

作者简介

周静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zhoujingwh@126.com

1 涌现中的淘宝村

在城市化浪潮下,乡村衰退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1]。费孝通^[2]曾经指出中国传统乡村经济组织有3种基本方式:小农生产、家庭手工生产和作坊生产。它们主要依靠熟人社会的血缘、亲缘等“关系”维系,因为缺乏规模效应和先进技术,又远离消费市场,中国传统乡村经济组织是区别于成熟市场经济组织的弱经济组织。

但是近10多年来,从乡村工业化到连接互联网,中国农村地区涌现出大量淘宝村^①,新农人利用电子商务销售农村各种特色产品,逐渐打开了销售农村产品的线上市场。这些淘宝村

(镇)呈现出巨大的自下而上、蓬勃发展的活力。在淘宝村密集分布的苏南地区,这里到处可以看到类城镇化的景观和碎片化的空间:新建的多层农民住区,大量家庭作坊、微小淘宝店分布在其中。镇村原有机械、电镀、化工企业基本退出,生产向适于线上交易的地方优势产品进一步集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南乡镇企业发展遗留下来的厂房被更新改造为适应新经济的生产办公空间。早先的农村交易市场发展为规模庞大的专业市场,花3天时间也走不完市场里的每间店铺。周边10 km²甚至更广大的范围内,大大小小的电商产业园、厂中厂、家庭作坊被互联网连接到社会化的分工体系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电子商务对农村社会网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以江苏‘淘宝村’为例”(编号51508365)资助。

注释: ① 2020年沿海六省共计出现4 985个淘宝村,占全国淘宝村总数的比例超过90%。

中。传统农村的弱经济组织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信息技术 (ICT) 的协同作用下演化为一种强经济组织^{[3]66},推动地方产业迭代升级。

作为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可能路径,淘宝村已经引发社会及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对于上述现象,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是ICT和电子商务的应用引发了淘宝村的形成^{[4]6},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村庄发展成为淘宝村,而另外一些村庄则不会;也有一些学者的观点将其归因于新农人的草根奋斗行为^[7]。

综合上述两种观点,笔者提出淘宝村的涌现可以看作是技术与乡村社会共同演化的作用过程与结果^{[3]87}。本文试图通过重新审视空间三元辩证关系,并嵌入ICT—行动者这一动力系统,从而更加全面地解析淘宝村的社会空间实践。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苏南地区淘宝村及周边逐渐形成的社会化分工协作空间是如何被建构的?淘宝村促进当地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出现了哪些新的矛盾和空间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淘宝村是如何被激活并被赋予新的地方意义?

2 空间三元辩证的再审视

列斐伏尔于1974年在其代表作《空间的生产》一书中认为空间是社会生产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的过程,并提出空间三元辩证的思想。一是物质空间,指向物质性,包含构成日常生活的“路径和网络”。涵盖了建成环境和物质生产过程,是具象的、物质化的空间实践。二是象征空间,即人为建构的想象空间,充斥着意识形态、权力和知识。空间的符号想象,包括标识、符号、编码和知识等,在塑造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时扮演重要的角色。三是社会空间,表达了社会准则、价值观和经验。在此基础上,列斐伏尔强调空间三元^②的同时性和统一性。三元空间并非各自独立存在,而是“不断变化并具有独立特征的相互关联”,是“社会—空间”辩证统一的具体体现^{[6]10}。

索亚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基于对现实的观察,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在《第三空间》中

对后现代大都市洛杉矶的空间现象进行多维审视。分散化的洛杉矶与工业时代大都市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性,索亚^[11]提出“第三空间”的新解释,认为“第三空间”的重要性在于帮助人们理解真实世界空间的动态变化、复杂性和矛盾性。“第三空间”不应被固化在某个范围内讨论,应保持开放状态,并保持批判与思考的态度。

卡斯特^[12]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指出ICT作用下传统空间流动性的转向,认为新的流动逻辑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对纷繁复杂的现象与资料归纳、推导基础上,提出了经典的流动空间3个层次。同时,卡斯特也指出随着流动性的控制力日益增强,我们不能忽视地方的发展和对现实“日常空间实践”的关照。

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笔者试图将信息技术 (ICT) —行动者嵌入空间三元辩证的讨论,对淘宝村的空间性进行再审视。嵌入ICT—行动者,把空间三元看作一种动态演化的过程,既是为了阐明技术“洪流”时代充满复杂性、矛盾性的真实世界,更是为了找到潜在的驱动空间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

首先,三元空间本质上是对同一空间的不

同角度辩证、动态发展的思考。文中分别表述为物质性、象征性和社会性。

其次,基于互联网开放性,ICT—行动者更倾向于网络化、扁平化的组织关系。这与工业时代层级化组织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ICT打破了信息的层级式传递和时空限制,信息共享更有利于多元行动主体与利益相关者采取行动,形成协作。认识到各自行动的意义,以及各行动主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13],有助于发挥各行动主体的积极作用。也要警惕技术优势引发新的垄断。

最后,在ICT—行动者的作用下,催生了新的空间需求及空间使用模式。新的空间生产又反过来影响ICT—行动者的演化,形成新的行动与文化认同(见表1)。

下文以苏南地区常熟淘宝村集群作为观察对象(见图1),探讨在ICT—行动者的作用下,物质空间、象征空间和社会空间各自是如何表征的,回答前文提出的研究问题。

3 淘宝村的空间生产

3.1 物质性空间生产

不断增长的线上市场激发了农村地区的生产供给^③。经历了10多年的电子商务发展,苏

表1 空间三元辩证的再审视
Tab.1 Review of space ternary dialectic

代表学者	代表作	空间生产的相关解释
亨利·列斐伏尔 (1974)	《空间的生产》	空间生产可被划分成3个相互辩证关联的维度或过程。从现象学出发,可以表达为“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三元。从语言学或符号学出发,可以表达为“感知的”“构想的”“生活的”空间三元
大卫·哈维 (1989)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试图弥合马克思与列斐伏尔两者之间的断裂,从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出“资本三重循环”模型,把空间的生产地理学表述为“资本主义地理景观生产”,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
爱德华·索亚 (1996)	《第三空间》《后现代地理学》等	将空间三元分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3个维度,提出“第三空间”,认为后现代城市是充满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真实世界。对空间的理解必须不断扩展
曼纽尔·卡斯特 (2000)	《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	强调ICT技术的空间生产影响。在ICT作用下传统空间性发生转向,新的流动逻辑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综合上述学者思想,本文将ICT—行动者嵌入信息时代的空间三元辩证讨论		(1) 物质性空间生产:新技术被行动者广泛采纳并显著提高生产效率,新的空间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现象出现。信息技术促进网络化的经济组织有效沟通,有利于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化分工协同的空间生产 (2) 象征性空间生产:在这一视角下,空间是一种思想性和观念性的领域。信息时代新的空间生产表征着ICT—行动者的集体认同;互联网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属性特点正在浮现 (3) 社会性空间生产:空间组织是一种社会的产物,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真实世界的空间又受到各种制约,呈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注释:②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三元在现象学层面可以表达为感知的 (perceived) 空间、构想的 (conceived) 空间和生活的 (lived) 空间。

③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多层次的消费市场和庞大的国内消费群体。

南地区淘宝村(镇)的生产进一步向适应于互联网交易的优势产业集中。不断围绕电子商务经济活动,重组生产空间^[14]。

(1) 零星分散的初始阶段

在苏州常熟地区,随着互联网市场被逐渐打开,带动了本地成衣工厂和大量农村家庭作坊加入生产。“一个电子商务设计运营团队连接着生产、加工、物流等多个工厂,如果设计一件销量达50万件的服装,就能养活3家工厂。”成衣工厂来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常熟本地乡镇企业转制后的私营企业,一些新的工厂则是随着常熟服装市场发展而出现的。

发展电子商务之后,莫城街道及下辖村庄原有机械、电镀、化工企业基本退出,生产类型向服装行业集中。连接互联网之前,与大部分工业型乡村类似,莫城街道村庄也多是“马路经济”,沿着省道两侧分布着大量生产性工厂。2000年以后,中小型服装生产企业、配套企业数量快速增长,进一步向村庄内部延伸新建大量厂房。

农民集中住区成为新经济重要的居住/生产复合空间载体。2000年以来江苏推进“三集中”政策,传统的乡村临水而居的方式被农村集中社区替代。大量家庭作坊、小微淘宝店分散在农民集中居住区。

笔者于2016年的调研记录显示,“村投入资金1 000多万元,完成了农民集居地建设,已经建成言里新村、泗泾新村、石岸巷新村、蔡家巷新村4个多层次(5层楼房)集中居住区和恩潭新村双层式集中居住区,共计新宅300多户……户主一般居住在顶层,余下4层房屋全部用于出租。村里有大量可供出租的房屋。这种新村房屋在建设初期就考虑到出租的可能性,为了避免外来租客的干扰,特意设置了南北两个方向楼梯,互不干扰。言里村底楼单间租金为850元/月,两室户租金为1 200元/月左右。房东通常会在出租信息上注明:适合做加工,开淘宝店,做仓库”。

(2) 加速演化阶段

ICT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一方面不断消灭传统中间分销环节,另一方面又演化

出新的基于网络的中介或者称为“信息中介”^[15]^[14]。在常熟淘宝村,阿里巴巴跨境电子商务中心服务商(常熟)、敦煌网、蝶讯网等典型“信息中介”出现集聚现象。“信息中介”在构建互联网的协作系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网上交易数据的积累,数据驱动生产作用开始显现。通过历史交易数据预判未来销售,完善供应链管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常熟服装多品种、小批量、短交期要求的新型业态开始显现^④。

传统服装品牌开始将自己改造为“多渠道”组织形式,即“砖头和点击”模式^[15]^[14]。2018年底,言里村有50人以上的服装企业10家左右,10人以上加工作坊500家左右,另外加上小作坊、仓库、宿舍、网店共800多家。这种生产网络兼具弹性,可以调整生产,重新组合应对快速变化的互联网市场。

同时,随着互联网销售逐渐形成一定规模,本地独立设计师开始成长。莫城街道开始出现原创女装品牌设计师的集聚现象^⑤。初创企业、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中介”、独立设计师等新兴的市场行动者,构成了ICT作用下常熟服装生产的社会—技术系统演化的关键性力量。他们在不断实践中逐渐掌握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并快速迭代。

这一阶段,大大小小的电商产业园、厂中厂、家庭作坊、“淘宝村一条街”等在空间上形成。到处可见遍布全村的涵盖高、中、低端生产的厂房与作坊。大的生产企业通常有独立的一栋办公楼,小的生产企业通常几家合用一栋楼,更小的家庭作坊会租用农民集中住区(见图2-图3)。

(3) 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分工协作正在形成

随着电子商务与常熟服装产业深度融合,常熟服装市场与周边淘宝村从“农村交易市场+生产加工基地”简单协作,转向基于互联网的复杂协作生产组织。

在这场互联网革命中,服装市场演化出更为复杂的功能。对外,通过互联网连接全球范围的信息及优质资源;对内,不断整合地方资源,提供区域性公共服务,使地方化联系更



图1 常熟莫城淘宝村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aobao Villages in Mocheng, Changshu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常熟莫城电商产业园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angshu Mocheng E-commerce Industrial Pa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常熟莫城居住空间
Fig.3 Residential space in Mocheng, Changshu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加紧密。在原实体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常熟服装市场频繁举办各种国际/国内交流会。2014年开始发布全国性男装行业指数,原创设计团队、功能平台、数据服务公司、大型电子商务企业等都在快速集聚过程中。2017年常熟服装城市场成交额达1 488亿元,出口额达13亿美元,成为具有“枢纽”功能的节点。

注释: ④ 实地调研发现,阿里巴巴、敦煌网为企业 提供跨境电子商务服务,辐射整个常熟甚至苏州市;蝶讯网为服装生产上、下游企业提供专业信息,包括新兴面料、流行元素、时尚走秀等讯息,并为付费会员提供服装样板矢量图,以及为企业提供员工培训与游学服务;还有的是为企业提供各种网络营销代理。

⑤ 电子商务发展之前,常熟服装以生产设计要求不高的男装和中老年休闲服装为主。互联网发展之后,在男装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也带动了女装的快速发展。通常女装品牌设计师更多倾向于聚集在大城市。

服装城附近大大小小十几个村庄组成庞大的本地化生产网络,并形成一定的差异化分工。在ICT的支持下,每一个有创新想法的人都有可能加入这场农村电子商务经济活动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正推动着农村地区的生产融入更大的供应链体系——一条条线上市场供应链上、下游的连接,像毛细血管一样,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和各种农村特色产品连接到全国甚至全球生产网络中。

电子商务交易中,生产者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反馈创新产品。这种来自电子商务“自下而上”过程的创新促使组织不断调整迭代,线上市场不断涌现出各种小微创新。与此同时,随着密集的高铁网建成通车、区域交通一体化,一批苏南小城镇迈入高铁时代,发展必将进一步加速。

3.2 象征性空间生产

创造地区形象、助力转型升级的象征性空间生产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象征性的空间生产统一了生产、设计、互联网视觉传播的物质实践,促使外界对苏南乡村有了新的认识。

(1) 宜居宜业整体形象展示

农村电子商务经济的繁荣带来地方发展的正向反馈。2017年地方政府启动“云裳小镇”计划。在获批江苏省特色小镇后,获得省级政府的支持和财政补贴^①。国有资金作为外生力量介入村庄原本内生的治理格局中^{①⑥}。云裳小镇总规划面积为3.62 km²,规划定位为“纺织服装产业基地、文化旅游观光地、生态宜居地,打造中国服装产业新智造示范基地、中国服装产业创新示范基地和全球时装产业创意之都”。目前物质空间已经基本建成。

(2) 共享的“小镇客厅”

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中,“小镇客厅”似乎成为一种标配。“小镇客厅”受到客厅作为会客交流功能的启发,是当地对外交流、展示的公共空间^{①⑦}。在官方宣传文件中,云裳客厅是“市新联会莫城街道分会的重要载体,为新阶层人士提供政策解读、企业党务咨询、产业技能培训、学习交流、路演发布等服务”。建成的云裳客厅采用灵活可变的室内空间组织

和设计,来满足上述多功能活动的需要。

(3) 一种互联网商业的消费景观出现

旧厂房更新改造的符号性表达强烈。特色化的互联网店铺越来越多,似乎越独特、越与众不同,就越能突显店铺的时尚风格。

笔者于2021年的调研记录显示,“正在外观改造配套升级的金剪刀艺术坊,建筑立面上采用江南风格坡屋面形象作为装饰,夸张且符号意味强烈;新型表皮主义不仅表现为街道立面、老厂房外立面,还体现在建筑内部。为了适应直播销售,建筑室内空间采用或潮流、或怀旧的布景式改造,充斥着各种‘网红化’的元素符号。背景、灯光、货品摆放、室内小品,甚至卖货人本身也成为一道重要的风景。由厂房原货梯改造的员工乘坐的电梯内,‘青春万岁!坚持、梦想与奋斗’‘即使第一百次跌倒,我还可以第一百零一次站起’等宣传语十分醒目,激励着在这里每天上下班的年轻人”。

大量活动节日被“人造”出来,对外展示新的江南水乡地方形象。这些节日既非传统乡村节庆,也不同于城市艺术节,目的是推动地方经济。如“江南国际时装周”通过展览、论坛、走秀、竞赛、评奖5大主线活动,将国内外纺织服装专业品牌、供应商与采购商、优秀设计人才等全部汇聚于常熟,不仅有效推进商贸合作、资源整合,更成为常熟的城市名片。另一活动“云裳青年创客文化周”则更加鲜明地指向创业青年,涵盖青年时尚论坛、主题系列创意作品展、插画征集、快闪等活动(见表2)。

表皮化的更新改造和“人造”节日的涌现,回应了互联网消费经济的崛起,向外展示了新江南繁荣景象,但在挖掘江南人文底蕴上还远远不够,更与既有的和本地生活难以

形成情感连接。我们需要在历史记忆、本地生活和互联网经济中找到一种平衡,避免过度的消费性文化与消费景观出现,重塑生态文明价值观下新时代的地方集体认同。

3.3 社会性空间生产

2014年以前,地方政府仅是对国家“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政策的例行呼应,对乡村自发的分散化的电子商务活动并没有介入和干预。但是随着常熟服装生产的社会—技术系统不断演化,市场的蓬勃发展并不意味着政府的作用减弱,相反地方政府的作用日益重要^①。苏南地方政府属于典型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经济类型^{①⑧}。前期工业化积累的大量资本进一步注入地方新的发展中,推动功能性空间集聚,并统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莫城管理区着手租赁村里老厂房,对其统一更新改造,进行功能集聚引导。将原本分散化的一些较大规模的电子商务企业和创新性服装企业集中到园区,并作为空间载体承接服装城转型升级的新的功能外溢。

(1) 强烈的用地需求与频繁调整的规划

快速发展的电商产业“圈地”行为与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形成强烈的冲突^①。常熟市城规超出土规建设用地约182 km²,仅通过“多规合一”图斑差异处理所腾挪的指标远不能保障城市发展要求^{①⑨}。利用国土资源部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提出“三优三保”政策(见图4)^①。莫城街道整合村级工业用地,打破传统二元结构,编制《常熟市莫城街道村级工业用地整合优化规划》,确定整治退出工业地块52个,用地面积1 008.94亩(约67.26 hm²),占莫城街道村级工业用地的30.8%。整治退出工业地块内不允许在建设用地区域内有新的建

表2 淘宝村的象征性空间生产
Tab.2 Symbolic space production of Taobao Villages

空间生产类型	空间功能	文化意象表达	传播方式
特色小镇	办公、商品房、宿舍、公共食堂等	宜居宜业的整体形象对外展示	线上线下宣传
“小镇客厅”	对外交流、展示的公共空间	开放、交流	线上线下宣传
更新改造	办公、出租	互联网消费文化、新江南文化	线上线下宣传、网红打卡地
节日活动	举办竞赛、时装艺术周	互联网消费文化、新江南文化	线上线下宣传、直播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实地调研自制。

注释: ① 空间规划是指导国家资金和政治资源投放的重要参考。计划2018—2020年3年共投资30亿元建设。2018年累计投资就达到13.89亿元,其中国有投资7.64亿元。

② 2014年8月《市政府关于印发〈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出台,该政策是常熟市首次出台扶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专项扶持政策,标志着地方政府对农村电子商务的支持工作的全面铺展。随后,常熟市被评为全国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③ 此外,村民建房的愿望非常强烈,村庄违法建设现象频频发生。近年来莫城街道违法建设累计排查待治理项目200多个,面积30多万m²。

④ 即通过优化农用地结构布局、优化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和优化镇村居住用地布局,做到保护资源更加严格、保障发展更加有力、保护权益更加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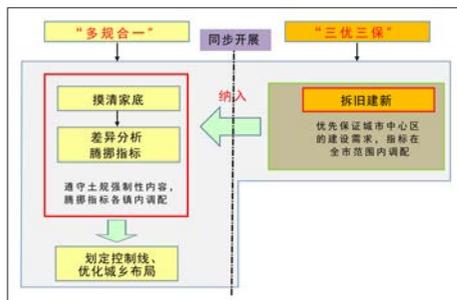


图4 “多规合一”和“三优三保”的关系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integration and land polic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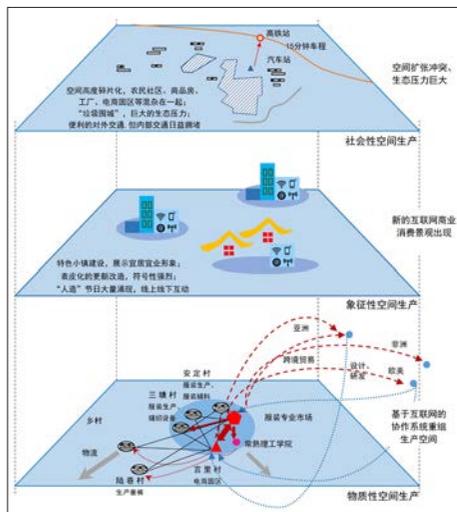


图5 淘宝村的空间生产
Fig.5 Diagram of Taobao Villages' production of spa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设计行为,用地指标转给市政府统筹发展,并将用地指标流转到重点项目。在推进老旧工业区更新改造过程中,莫城街道鼓励原土地使用权人组团联合开发^⑥,通过制度创新盘活土地和空间资源。

2013年《莫城电子商务产业园规划》编制完成。在此基础上,2018年编制了新的《常熟市莫城云裳小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用地范围扩大到3.6 km²。以创造宜业宜居环境为目标,进行整体的产业规划和布局,充分利用原有老厂房进行更新改造。《常熟市莫城街道莫城社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进一步优化了莫城社区的用地布局,逐步完善各项功能设施配套。

为了协调统筹资源,2017年莫城街道与常熟服装城实行“区政合一”管理体制^⑦。在

表3 淘宝村的空间生产
Tab.3 Taobao Villages' production of space

空间生产	ICT—多元行动主体作用	ICT—乡村社会转型
(1) 物质性空间生产: 随着互联网市场打开,生产向适于线上交易的地方优势产品进一步集中;形成大小小电产业园、厂中厂、家庭作坊、“淘宝村一条街”等;专业性市场发展成为“功能性枢纽”	平台企业 新农人、电商企业、消费者	苏南小城镇及周边淘宝村作为地方化的集聚体,是鼓励具有实干精神的草根创新空间,并正在成长为参与区域经济的全球竞争的重要基础。转型具体表现如下: 1. 经济方面 (1) 提供工作机会,吸纳大量农村闲散劳动力,成为年轻人的创业基地; (2) 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化协作系统,以及一种新的农村强经济组织正在形成。
(2) 象征性空间生产: 特色小镇建设;“小镇客厅”;表皮化的更新改造与符号化;大量“人造”活动节日	地方政府与空间规划	2. 文化方面 (1) 积极塑造时尚化、国际化新江南水乡形象,助力地方转型升级; (2) 新的互联网商业文明的消费景观出现; (3) 需要在本地生活和互联网消费经济中找到一种平衡。
(3) 社会性空间生产: 类城市化景观、碎片化空间;土地利用冲突与空间规划;大量外来人口与治理挑战;生态环境压力巨大	原村民、村委会	3. 社会治理方面 (1) 新经济空间扩张强烈,规划调整频繁; (2) 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过程中,新的冲突和问题不断出现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领导模式、政策支持、管理模式等方面全面构建区一级政府在乡村建设中的主导角色。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对于乡村治理的干预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确保了调动资源支持本地服装产业发展的能力。

(2) 大量外来人口与治理挑战

一方面,新经济活动促进了淘宝村集体租赁收入增长,集体财力的增长又进一步反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苏南农村的集体经济自1997年对传统集体经济的改制之后,开始以新的形式出现。通过租赁厂房和土地出租获得租金是其中最普遍的一种方式^[20]。在言里村的一份文件中,明确要求“依托原有标准厂房,确保资产升值,形成稳定的财力来源。充分利用区域内的边角地块,整合资源,加大配套性集体财力载体的开发建设,发展功能性服务”。2016年,言里村级资产总额达6 015万元,拥有标准厂房37 000 m²,商用房700 m²。正是由于言里村保有一定的村集体资产,每年才能获得稳定的租金收益。

另一方面,新经济发展吸引的大量外来人

口也给村庄的管理增加了难度。外来人口对住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供应均造成较大压力。由于租房多以“三合一”的方式存在,即生产、仓储、住宿在同一场所,每年街道村委不得不定期对地区内数以千计的家庭作坊进行整改,以保证消防安全,减少安全隐患。

(3) 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

小规模的企业产品制造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淘宝村热销的产品中多以服装、家纺、家具等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为主。这类产品对技术的要求不高,但对农村资源的消耗较大,环保监管较为薄弱,对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探讨淘宝村现象及后续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从单一角度理解,空间三元辩证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通过对淘宝村空间性进行多角度的切片观察,有助于厘清乡村的转变过程,把握各种驱动空间向前发展的力量。笔者将ICT—行动者的影响嵌入空间三元辩证关

注释: ⑥ 在现实需求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常熟市人民政府颁布《常熟市老旧工业区(点)联合自主更新操作指南(试行)》(常政办发[2022]50号)。

⑦ “区镇合一”的管理体制,即将产业园区与镇(街道)合二为一,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整合归并政府职能,减少管理层次,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系中,既是对空间三元辩证理论工具的应用延续,也是研究方法上的补充。

本文认为苏南地区淘宝村是具有实干精神的草根创新空间,其经济组织发生了明显的跃迁,并正在成长为参与区域经济之全球竞争的重要基础。淘宝村正在变成一个多主体、多功能、多维度的空间。在电子商务经济以及ICT的协同效应作用下,专业镇及下辖村庄进一步向优势产业集中,不断围绕电子商务经济活动重组空间,基于互联网的社会化分工协作正在形成。它具有巨大的活力,但同时用地冲突、治理挑战、巨大的生态压力等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凸显。

保持淘宝村持续的创新环境,需要多方行动者的协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规划工作者需要积极思考并应对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是尊重技术与乡村转型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新技术对于空间革新的推动作用是当前规划研究与实践必须捕捉的物质事实。如何满足淘宝村地区集聚的大量(甚至是十几万)外来人口的生产、生活需求亟需思考。

二是淘宝村地区在获得经济发展机会和竞争力的同时,更需要重视生态安全、新的地方文化和精神需求。如何将地方生活、个人、市镇和流动的网络社会结合在一起,重塑公共空间,保障生态安全,避免过度的消费文化景观,创造更好的人居环境值得思考。规划不仅是空间资源合理配置的手段,亦承担着寻找地方意义、体现人文关怀以及塑造美好生活的责任。■

(致谢:感谢苏州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冯文苗对本文图纸的绘制工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龙花楼,屠爽爽.论乡村重构[J].地理学报, 2017, 72(4):563-576.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4): 563-576.
- [2] 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FEI Xiaotong. Peasant life in China[M].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3] ZHOU J, YU L, CHOGUILL C L.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y and rural society: the blossoming of Taobao Villages in the information era,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1, 83(4): 81-87.
- [4] 罗震东,何鹤鸣.新自下而上进程——电子商务作用下的乡村城镇化[J].城市规划, 2017(3): 31-40.
LUO Zhendong, HE Heming. New urbanization from below in China: rural urbanization driven by E-commerc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7(3): 31-40.
- [5] 陈宏伟,张京祥.解读淘宝村:流空间驱动下的乡村发展转型[J].城市规划, 2018, 42(9):97-105.
CHEN Hongwei, ZHANG Jingxiang. Taobao Villages: 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the space of flow[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8, 42(9): 97-105.
- [6] 崔丽丽,王骊静,王井泉.社会创新因素促进“淘宝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实证分析——以浙江丽水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 2014(12):50-60.
CUI Lili, WANG Lijing, WANG Jingqua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ocial innovation factor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 "Taobao Villages" - a case study of Lishui, Zhejiang[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4(12): 50-60.
- [7] 曾亿武,郭红东.农产品淘宝村形成机理:一个多案例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 2016(4):39-48.
ZENG Yiwu, GUO Hongdo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gro-Taobao Village: a multiple-case study[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6(4): 39-48.
- [8]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2.
LEFEBVRE H. Production of space[M]. LIU Huaiyu, et al, translat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2.
- [9] 克里斯蒂安·施密特,杨舫,朱天禹.迈向三维辩证法——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J].国际城市规划, 2021(3):5-13.
SCHMID C, YANG Shan, ZHU Tianyu. Towards a three-dimensional dialectic: Lefebvre's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21(3): 5-13.
- [10] 杨舫,陈弘正.“空间生产”话语在英美与中国的传播历程及其在中国城市规划与地理学领域的误读[J].国际城市规划, 2021(3):23-32, 41.
YANG Shan, CHEN Hongzheng. Dissemination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the context of Anglo-Saxondom and China and its misreading in the fields of Chinese urban planning and geography[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21(3):23-32, 41.
- [11]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SOJA E W. Third 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M]. LU Yang, translate.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
- [12]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XIA Zhujiu, et al, translate.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2006.
- [13]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XIANG Biao. Village beyond borders: life history of 'Zhejiang Village' in Beijing[M]. Beijing: Sanlian Books, 2018.
- [14] 周静.电子商务推动的乡村空间重构——以南通三合口村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 2018(12): 69-75.
ZHOU Jing. Rural development and spatial reconstruction driven by E-commerce: a case study of Nantong Sanhekou Village[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8(12): 69-75.
- [15] CURRAH A D. Behind the web store: the organization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multichannel retailing in Toronto[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02, 34(8): 1411-1441.
- [16] SHEN M, SHEN J. Governing the countryside through state-led programs: a case study of Jiangning District in Nanjing, China[J]. Urban Studies, 2018, 55(7): 1439-1459.
- [17] 陈晓,陆邵明.共享视野下的小镇客厅营造模式浅析——以杭州骆家庄文化家园为例[J].新建筑, 2020(3):150-155.
CHEN Xiao, LU Shaoming. An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small town living ro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ring: a case study of Luojiashuang in Hangzhou[J]. New Architecture, 2020(3): 150-155.
- [18] 温铁军,等.解读苏南[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3.
WEN Tiejun, et al. Interpretation of southern Jiangsu[M].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9] 何子张,洪国城,李佩娟.基于城乡统筹的存量规划与机制创新研究——常熟“多规合一”实践[C]//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HE Zizhang, HONG Guocheng, LI Peijuan. Study on stock planning and mechanism innovation based o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Changshu 'multi-regulation' practice[C]//Proceedings of 2016 China Annual Planning Conference.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6.
- [20] 刘志彪,张月友.新苏南模式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协同发展[J].中国国情国力, 2018(5):53-56.
LIU Zhibiao, ZHANG Yueyou. New southern Jiangsu mode promot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ulti-ownership economy[J]. China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Strength, 2018(5): 53-56.